

双向启蒙： 论现代印刷技术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学

——以文化产业为视角

◎ 韩晗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同时在中国出现,两者构成了生产工具与产品的关系。以文化产业为视角论说,现代印刷技术依靠推动文化权力的下放,并借助市民文学的传播,以技术介入的形式参与推进乡村城镇化、居民市民化与文化产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其启蒙价值。作为启蒙的动力之一,现代印刷技术可有效提升市民文学的启蒙作用,使得市民文学有着更广的传播空间与更多的接受群体,并在实践启蒙的过程中逐渐因产业化发展而形成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因此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化,促进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形成了双向启蒙的力量。

【关键词】现代印刷技术 近代市民文学 启蒙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3-092-07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3.014

近十年来,以侦探、市井生活以及科幻等为主要题材,包含散文、小说、新闻轶事、竹枝词乃至广告等不同体裁,涵盖图像、照片等多种表现媒介的中国近代市民文学构成了海内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综合反映了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对中国传统话本文学、章回小说的精神赅续,也是因全球化知识交流而形成的新兴文化形态。

研究近代市民文学的角度各式各样,但无法忽视近代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这是完全有别于先前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特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小说,都是通过以语言为载体的口耳相传、“场上案头”的二元舞台艺术或传统的书籍刊印而广为人知并代代流传。近代市民文学,则是凭借

现代印刷技术向都市中的人群传播,构建了文化科技融合为文化产业并服务于启蒙实践的一个范例,在客观上反映了产业革命与技术转移对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此,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彼此促进,形成了双向启蒙的互动关系。

本论所言市民文学这一概念,是基于马克思“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1]这一经典论断而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而城镇化首要任务是促进常住人口市民化。城镇化与市民化的目的是现代化,这也是实现启蒙的重要路径。^[3]因此,市民文学并非一种既定的文学题材,其创作主体与主要受众是中国社会的新兴阶层——市民,其中还包括相当一大部分为了生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服务价值与文化传播评估理论与技术”(2017YFB14004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研项目“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生及演变机制研究”(2020SK010)

作者信息:韩晗(1985—),男,北京人,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

计而卖文的无名作者。^[4]综合反映了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即市民性。其内涵并非由题材或体裁限定，而是包括一种具有启蒙意识的文学观念（litteratura），其传播形式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化产品所体现。

放眼早期全球化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人类的新旧文化转型很大程度上以市民文学为先导。^[5]若立足技术对文化的影响研判，现代印刷技术降低了出版物的成本，扩大了受众群体，催生了现代出版业。而市民文学在扩大受众群体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两者殊途同归，共同孕育了文化产业的发生，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全球化流动与商品化交换。

目前学界对技术、文化、启蒙三者间关系的研究，多围绕技术所营造出的现代媒介与公共空间这一层面进行论述，如技术如何塑造公众舆论、打破信息控制、推动观念解域化传播与营造虚拟公共空间等。但上述研究多半强调技术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启蒙的意义。而近代中国自有其特殊之处，技术、观念的更新与文化产业的出现，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三者间的关系调理复杂而又彼此干预，因此应将其放置在一个总体研究的框架下予以讨论。

以近代市民文学与现代印刷技术的共同启蒙性为研究视角，目前学界所见成果不多。据笔者统计，仅有姜荣刚的《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陈钢的《印刷术在晚清的剧变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出版》，2010年第16期）、雷启立的《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与文化生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吴燕的《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郭浩帆的《晚清印刷技术的提高及其对小说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等篇什有所涉及，但就研究视角而言，仍停留在对小说这一专门文学体裁及其所形塑的社会公共空间。此外，芮哲非的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UBC Press, 2011）与 Victor H. Mair 主编的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从印刷文化的角度，诠释了晚清以来文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吕文翠的《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1849—1908）》（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9年）则从

市民的角度阐释了文学的启蒙性。

一、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的发生

1. 现代印刷技术的早期对华转移

活字印刷与古登堡转轴印刷法是中华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分别贡献给世界的文化遗产。本文所论之现代印刷技术则特指工业革命以来，自西方传播入华的印刷技术，因此与前两种印刷技术关系不大。现代印刷技术的基础是现代科学技术，即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技术，而非依赖于人工劳力。

现代印刷技术出现的标志说法不一，但任何科技的发展，基本标准就是解放人力。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印刷技术经历了一个持续改良的过程。1620年前后，荷兰人 W.J. 布劳在古登堡印刷机的压杠上装配平衡重锤，节约了人力物力，改良了古登堡印刷术，被称为荷兰印刷架。1798 年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发明了石印技术。18 世纪末，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并将人类带入蒸汽时代。1822 年，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印刷厂首先在印刷机上采用蒸汽机动力，这为批量、规模化的大型印刷提供了条件。1846 年，美国 R.M. 霍伊公司研制并投产乐轮转式印版与圆筒式印刷机，促使欧美的印刷技术飞跃式发展。

因同处于全球化时代，近代中国的印刷技术与世界一直保持同步。早在 1830 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就曾在广州、澳门等地开办印刷所，将代表现代印刷技术的石印技术从欧洲、美国、日本通过通商口岸带到中国，再通过洋务派、买办、民族资本家或外国商人、传教士开设的现代印刷厂向上海、武汉、南京、广州、香港等地普及传播。其中，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姜别利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主持宁波美华书房，贡献尤为卓著，他发明了用电镀法制造汉字铅活字铜模，制造出了 1 至 7 号大小的七种宋体铅字，世称美华字，沿用至 20 世纪中叶。1872 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办《申报》及申昌书局推广石印技术，使得中国现代印刷技术在总体上有所提升。^[6]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宁波商人开办的拜石山房与广东商人徐润的同文书局相继引入石印技术，“此地（广州）在（外）人经营下的印刷所已引起华人的爱慕，我们听说他们也办了一个印刷所，与之竞争”，“以往四年以来，此间一家石印书局营业十分兴隆”，且“上海现有石印书局四五家，用蒸汽机石印法已印成中国著作数百种，其所印的书行销全国”。^①至此，转移入华的现代

① 以上三则史料引自于宋原放等《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印刷技术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开花结果。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印刷技术得以发展，而市民基础最深厚的上海及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成为现代印刷技术在中国发展的桥头堡。据统计，当时已有的19种凸版、平版、凹版系列印刷技术，其中13种率先在上海使用，又有7种归于商务印书馆。而在21种印刷机和印刷机械中，有15种率先在上海使用，16种现代印刷形式，商务印书馆一家就独占六席，^[7]这说明现代印刷技术早期对华转移以城市为中心，与市民文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2. 现代印刷技术推动了市民文学商品化

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市民文学商品化。1884年，《申报》旗下的《点石斋画报》创刊，首创画报这一新兴形式，刊登了如热气球上天、摩天大楼等市民喜闻乐见的图画与文字。尔后，《时务报》在1896年开始刊载《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记仇者复仇事》等国外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在沪上及南京、广州的市民中间广为流传，为近代市民文学商品化之肇始。

在此之后，以《新小说》（1902年）、《绣像小说》（1903年）、《月月小说》（1906年）、《小说林》（1904年）为代表的小说杂志以及北京的《启蒙画报》（1902年）、《开通画报》（1906年），广州的《时事画报》（1905年），上海的《东方杂志》（1904年）、《世界日报》（1908年）、《图画日报》（1909年）等画报相继创刊，初步形成了以市民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业态。上述作为文化生产者的近代出版企业推出了为数不少的市民文学佳作，包括以《新中国》《空中战争未来记》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以《华生包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及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艳情小说，吴趸人、李伯元、韩邦庆等凭借市民文学创作而成为沪上文化名家。

技术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特征是多业态并举，因此现代印刷技术推动市民文学商品化显然不只书报出版一端，内容上还包括以《沪江商业市井词》《申江百咏》为代表的洋场竹枝词、以《申报》广告为代表的各种广告、海派京剧以及走向“甲寅中兴”的文明新戏等，甚至还包括各类商品化的线描插图、钢版画、月份牌乃至早期摄影作品图像等，均以图史互动的形式，见证了现代印刷技术如何推动市民文学商品化。

曹聚仁认为：“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8]尽管不能说现代印刷技术

是近代市民文学发生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决定性因素。比较来看，在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巴黎一地就拥有20余家报社与出版社，每年印刷图书多达2万册，其中大多数与市民题材相关，书店与租书店遍布法国各大城市，这为革命的到来做了意识形态准备，支撑这一庞大文化业态的是遍布巴黎大街小巷的300余家印刷厂，^[9]这显然是推动市民文学商品化不可忽视的技术力量。

二、启蒙性：现代印刷技术的表现特征

1. 通过改良文化生产下放文化权利

若论现代印刷技术的启蒙意义，则无以僭越启蒙二字的内涵。康德认为，启蒙的意义，是促使一个阶层或是整个人类社会“脱离不成熟的状态”，^[10]这一说法广为学界所认同。由此可知，启蒙的主体可以是少数人，但客体则是社会的大多数。

古代中国，虽有当时领先世界的印刷技术，且有坊刻、官刻、私刻三种出版方式，但印刷品依然是文人唱酬、官府行文、刻印经书的稀有品种。就中国乡村的广大家庭而言，最多的印刷品无非是黄历、医书、占卜之类的读本，少数富裕的家庭拥有孩童启蒙读物。因此，古代印刷术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手段，但与现代印刷术相比，在传播手段上略逊一筹。当然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印刷摇篮本的古登堡印刷术特别是荷兰印刷架问世前，手抄本图书在欧洲也是贵族专享的奢侈品，且多半集中在君权与神权掌握者手中。

与任何科技一样，技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承担任何意识形态职能。因此现代印刷技术本身并非天然地具备启蒙属性，其启蒙性要靠被印刷的内容所赋予，而这正是双向启蒙的含义所在，即陆费逵所言“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文化系焉”。^[11]

现代印刷技术改良了文化的生产，对其效率与质量均有提升，综合降低了人力耗费，客观上平抑了文化产品的价格，带动了图书出售、租赁产业的兴起，使得现代印刷技术与市民文学共同形成了包括生产、消费、分配等在内的完整文化产业链，从而将文化权力下放给了大众。

嘉庆年间的长三角地区，最普通的一本书竟要价七百五十文钱，这是最便宜的书之一，^[12]可这仍是当地一石米（约合60千克）的价格。^[13]毫无疑问，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读到全套的二十四史与四书五经等大部头经典著述。但嘉庆之后不足百年的光绪年间，《上海新报》每份销售价是铜钱三十文，而《申报》新创时

的零售价格每份仅售铜钱八文，仅为嘉庆年间一本书的百分之一左右。^[14]

不只报纸如此，相对于康乾时代而言，清末民初的书价也几乎跌了大半。20世纪20年代初，大部分小说如《美人烟草》《香粉狱》等，每册均低于银洋3角，如果算上货币贬值率，只相当于康乾年间书价的十分之一不到。且现代印刷技术使得图书成为更易保管、存放、流通的文化商品，新兴的图书租赁业在沪上悄然兴起：

新小说有租阅的地方。租价是很便宜，只取得十成之一。听说是一个某志士创办的，这某志士开办这个赏阅社，专为输灌新知、节省浮费起见……这招牌儿叫着小说赏阅社，就开在英界白克路祥康里七百九十八号。他的章程很是便利，你要瞧什么书，只要从邮政局里寄一封信去，把地址开写明白，他就会照你所开的地方，立刻派社员递送过来听你拣选，以一礼拜为期。到了一礼拜，他自有人前来收的。你只要花一成的赏费，瞧一块钱的书只要花掉一角钱就够了，又不要你奔波跋涉，你想便利不便利？我们号里已赏阅了四五年了，好在这小说赏阅社里各种小说都全。今日新出版的，不到明日他已有了。^[15]

市民文学因其通俗易懂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门槛，而现代印刷技术又平抑了图书价格，这使得大量市民成为报刊图书消费的主体。从文化产业相关理论来看，现代印刷技术与市民文学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生产、消费环节且相对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模型。^①这个模型当中，现代印刷技术扮演着平抑价格、创新产品、活跃市场的重要角色，其促使更多的人通过阅读纸质印刷品来获得知识、增长见识，或进行工作之外的消遣。市民文学与现代印刷技术形成了早期的文化科技融合，技术被文化赋能，从而将文化权力下放到了普罗大众。

启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促使文化权力下放，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如是，日本明治维新如是，近代中国也如是。文化权力当然不会自动下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靠文化产业的力量，即将文化商品化，依靠市场经济形式进行交易，从而实现文化权力的流动、转移与下放。而现代印刷术正是促使近代

市民文学生产—消费这一商品化机制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2. 通过耦合现代化路径实现启蒙价值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里可以看到三条与启蒙相关的中国现代化路径：一条是中国乡村城镇化的路径，1840年至1912年，以公共租界中区为中心的上海城区面积扩大了4.5倍，而以沿江租界区为中心的武汉城区面积扩大了7倍；第二条是中国居民市民化的路径，1840年至1912年，上海市民人数翻了12.5倍，武汉则翻了10倍；^②第三条是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路径，即现代印刷技术与新兴思想的广泛传播，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产业，大量的市民成为文化的消费者与创作者。三条路径彼此交错，相互影响。

上述道路一方面逐步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体系与宗族社会制度，将当时人类文明最先进的部分带入国门；另一方面移植了西方的城市及其管理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城市文明，从而推动了近代市民文学的出现。在此格局下，现代印刷术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借助市民文学的传播，以技术介入的形式参与推进乡村城镇化、居民市民化、文化产业化进程，从而耦合了现代化路径，实现了启蒙价值。

中国近代的早期市民化所面对的是大量进城农民、手工业者等“引车卖浆之流”，当中多半是半文盲、文盲，因此中国近代市民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市民文学一样，绝无可能传播阳春白雪、诘屈聱牙的奥义之书，而只能是最为通俗的下里巴人之文，甚至要依赖图像等更为直观的载体传播。因此，市民文学中既有品格稍高的谴责、公案小说，或传播现代生活方式的古体诗与竹枝词，也有格调不高的侦探、科幻、艳情文学作品、插画、图片等。总体来说，其在内容、形式上都是对传统纲常的消解，大部分都在倡导人性、弘扬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客观上构成了启蒙作用。^[16]

现代印刷技术的日渐发展，助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枝繁叶茂。如出版商开始不断寻找妙趣横生的作品，“于是乎秘术横生，（书商）以青年幸进之心为钩钓读者之饵……极力探求读者的欢心……这可见我国编辑者

① 这一模型是基于Kim Timby就3D技术与科幻电影之间文化产业关系的研究，认为技术与文化的聚合可形成一个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模型（见Kim Timby. *3D and Animated Lenticular Photography: Between Utopia and Entertainment*,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15）。Kim Timby认为，模型中技术主要作用于降低商品成本与提升流通速度两个方面。

② 相关数据来自忻平《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述。

之堕落心罢了”。^[17]当然无需以精英主义者的居高临下姿态置喙市民文学逐利的一面，而应关注现代印刷技术如何将文化权力下放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的市民文学，虽由现代印刷术催生，更由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市民主导，这是其走向商品化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数以万计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居民，成为以市民文学为内涵的现代文化产业“赞助人”，这些城市居民中多数是受过教育却生活贫困的人群，如自由手工业者、低级职员、产业工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因饥荒、战乱、匪祸而不得不进城寻求生计的农民城市化改造而来。其中的多数人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且对都市新派生活方式充满向往，于他们而言，城市中的一切充满未知新生事物足以使人感到新鲜，而反映“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市民文学，恰可使之更快地了解城市规则并适应城市生活，这当然是启蒙的一条路径。

具体而言，交际舞、大剧院、公交车、银行、自来水、医院、商场、公寓……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统统陈列到了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国人眼前。如何使用？如何应对？又如何适应？无一不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大问题，尤其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更是急切需要有效解决之。如何让占多数的农民居民成为市民，即让早期中国城市中的居住者能迅速适应城市的现代生活（包括法治秩序、社会公德、交往方式等），这是时代赋予现代印刷术的重任，也是现代印刷术在近代中国所承担的启蒙任务。

近代市民文学中，洋场竹枝词是一个新形态，主要反映开埠之后上海的生活景观，是当时《申报》《上海新报》热衷刊登的文学作品。顾炳权编选的《上海洋场竹枝词》中，就有59种来自清末民初沪上的各大报刊。竹枝词对于市民生活现代化的描述可谓穷尽笔墨，如有四首洋场竹枝词这样写道：

地藏铁管达江中，曲折回环室内通。更置龙头司启闭，一经开放水无穷。

广连铁管到围场，灌足煤烟地下藏。入户穿街灯遍设，一经开点火生光。

举头铁索路行空，电气能收夺化工。从此不愁鱼雁少，音书万里一时通。

上下车中一刹那，每闻卖票打招呼。大家须要当心

点，只为人丛眩筐多。^①

竹枝词并非只有浮光掠影的都市猎奇之作，甚至包括“欲使洋场车马行，河渠沟浍悉填平。旧时风景全消灭，空剩桥名未变更”^[18]这样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者说。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市民生活，不单出现在竹枝词里，在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冶游小说中，更是屡见不鲜。以竹枝词为代表的近代市民文学，凭借现代印刷术而流传并畅行沪上，传播于新兴市民阶层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双向启蒙：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之关系

双向启蒙，是本文重点论述的核心话题。所谓双向，即指一种交互性（interactivity）关系，现代印刷术在实践启蒙的同时，也引导市民文学参与启蒙实践。同样，市民文学在实践社会启蒙这一历史重任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代印刷术的启蒙功能。

1. 现代印刷术是市民文学实践启蒙的重要催化剂

现代印刷术作为启蒙动力之一，可有效提升市民文学的启蒙作用，使得市民文学有着更广的传播空间与更多的接受群体，从这个层面上看，现代印刷术是市民文学推动启蒙的重要催化剂。

现代印刷术转移入华要早于近代市民文学在华的发生。早在19世纪30年代，现代印刷技术已进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反映人类社会文明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如造船、航海、医学、矿冶等）的教科书、工具书相继译介印刷，并批量供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学堂及教会医院使用，实际上已反映出现代印刷术的启蒙功能。

市民文学实践启蒙，须通过一种社会媒介来实现。而实践启蒙的文化因素显然不只市民文学一种，现代印刷术亦不为市民文学发生而生。但近代市民文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走向商品化，必须正视现代印刷术的作用。在近代中国，现代印刷术是最重要的观念传播技术。^[19]简而言之，现代印刷术为市民文学提供了实践启蒙的催化剂。

市民文学实践启蒙，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是重要因素。从科学史的视野看，技术在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当中所起的催化意义，也是技术体现启蒙特征的重

① 上述四首诗作者已不可考，均为《上海鳞爪竹枝词》（叶仲钧编）所收录，分别转引于顾炳权所编选的《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90、200、295页）。

要面向。^①

2. 市民文学以实践启蒙促进了现代印刷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启蒙实践的主体，市民文学是梁启超以小说开民智的具体实践与发扬，实践启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促进了现代印刷术的产业化发展。

学者韩琦与王扬宗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石印术于1832年传入中国，但到1880年以后才得到普及，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推广？”^[20]这里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石印术传播入华的1832年，当时文化产业并未在华发生，石印术只是用于传教士刻印《圣经》以及其他教会文献等，未与文化产业的相市场需求相结合，其技术革新缓慢，推广普及步履维艰。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在华外侨移植入华、国人自己推动的中国文化产业逐渐发生、发展，促进了文化与科技在近代中国的融合，并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革新与推广普及。

从文化生产、技术革新、市场需求三重视角来看，文化生产的繁荣会带动相关技术的革新，因此现代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身亦有市场诉求的层面。人类每一次文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化商品化推动的结果，在文化产业之前的文化交易与文化市场阶段，这一问题亦有出现，^②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21]

文化产业理论认为，市场需求会促进文化与科技纵深融合，而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则会推动技术呈现出一个逐渐上行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文化产业体系当中资本流动对技术发展所产生的驱动效应。^[22]因此，当市民文学影响愈大时，其市场规模就愈庞大，印刷术亦越发达。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业态不断创新，而与之相关的技术也获得了突破。宏观来看，除现代印刷术外，录音技术、摄影技术、灯光技术等也因西学东渐的技术转移，在中国获得了迭代革新。这个过程中，现代印刷术发展最快，也最具代表性。在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期，现代印刷技术在中国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印刷技术与规模在亚洲首屈一

指。以上海为中心，北平、汉口、南京、重庆等地相互呼应的印刷工厂形成了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现代印刷工业体系，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支柱之一，而这恰是因文化产业的技术需求而推动的。

结语

尽管近代中国的现代印刷技术到达了一定高度，但与之同时的现代造纸术却未跟上。究其原因，乃是造纸技术的现代化并未与印刷技术相适应，造浆工艺相当落后，仍主要依赖于江西铅山、安徽宣城、四川绵竹等老产地用传统技术生产出的纸张（如宣纸、毛边纸或黄麻纸），并非完全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生产出符合现代印刷术需求的专业用纸。^[23]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破损较重的图书竟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民国初年的文献已百分之百破损。^[24]因此，考量现代印刷术的意义时，不应忽视同时代其他文化生产技术中的短板。

宏观来看，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双向启蒙，这是技术与文化的一场重奏。近代以来，技术与文化关系一向交织复杂，而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这一双向启蒙的进程却是依托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的结果，启蒙实践之于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意义。从逻辑上看，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互动紧密的三角关系。

不言而喻，启蒙实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正如尤金·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25]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学。应如何评判不同时期且更为广义的印刷技术与市民文学之于漫长启蒙进程的作用，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学术课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 [2] 习近平：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2016-02-24（001）.
-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

① 影响社会启蒙的传播技术主要是现代印刷技术与互联网，其本身不参与启蒙。如Elizabeth Eisenstein认为，现代印刷技术对于启蒙思想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动力（Elizabeth Eisenstein. *Print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thought*, Réseaux, 1988年第31期，第7-38页），而D. Helbing则认为互联网与现代印刷技术一样，是文化平权的一种渠道（D. Helbing. *Towards digital enlightenment: Essays on the dark and light side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Springer, 2018年，第30-31页）。

② 如唐代以降，抄本兴盛之后，刻本应运而生，便是一例。此外，中世纪后期，欧洲插图手抄版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蔚为大观，尤其以卡洛林王朝为大宗，现存抄本多达9000册，不久之后古登堡印刷术问世。

- 政策[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 220.
- [4] 茅盾. 茅盾文艺杂论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843-849.
- [5] Russell J. Dalton, Christian Welze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 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21.
- [6] 汪家熔. 中国出版通史7·清代卷(下)[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120-125.
- [7] 芮哲非. 印刷与出版史能为中国学研究增添什么? [M]//王荣华. 多元视野下的中国.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61-72.
- [8] 曹聚仁. 文坛五十年[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66.
- [9] Robert Darnton, Daniel Roche.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0-42.
- [10] 康德. 什么是启蒙运动[M]//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72.
- [11] 俞筱尧, 刘彦捷.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73.
- [12] 袁逸. 清代书籍价格考——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三(上)[J]. 编辑之友, 1993(4): 73.
- [13] Wang Yeh-chien.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3.
- [14] 徐载平, 徐瑞芳. 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106.
- [15] 陆士谔. 新上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47.
- [16] 付建舟, 黄念然, 刘再华. 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272-273.
- [17] 郭沫若. 致《文学》编辑的一封信[M]//贾植芳. 文学研究会资料(上).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613-614.
- [18] 叶仲钧. 上海鳞爪竹枝词[M]//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295.
- [19] 张天星. 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1833—1911)[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2.
- [20] 韩琦, 王扬宗. 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M]//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 装订源流和补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3: 360.
- [21]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al Industries[M]. New York: Sage, 2002: 209-210.
- [22] Gabriele Troilo. Marketing In Creative Industries: Value, Experience and Creativity[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43.
- [23]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9.
- [24] 江河. 国图民国文献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J]. 北京档案, 2005(5): 10-11.
- [25] 尤金·哈贝马斯. 现代性: 一个未完成的方案[M]//高建平, 丁国旗. 西方文论经典(第六卷): 后现代与文化研究. 赵千帆,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11.

Dual Enlightenment: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Modern Citize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y

HAN H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citizen literature have emerged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hich constitu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tools and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y,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relies on promoting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ultural power.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value depend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itizen literature,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rural urbanization in the form of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 rural residents' citizen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lightenment,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nlightenment of citizen literature, which broadens the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the wider acceptance of citizen literature. Besides, a grand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has matured in the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due to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a grand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has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rinting technology, which has enabled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modern citizen literature to form an enlightenment duality.

Keywords: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modern citizen literature; enlightenment; cultural industry